

看展去

以贞石刊不朽

——“大汉雄风”展中的书法与题跋

童衍方

编者按

近日，“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展。展览以立轴35件套（50件）、展柜44件珍贵藏品，展现两汉重要的刻石、碣石、石阙、摩崖、碑版、石经、画像石拓本。如展览介绍中所说，“汉人创造隶书，奠定标准汉字基础。汉碑刻立于郡邑通衢、墓葬神祠、穷崖绝谷，以文字铭功德，以贞石刊不朽”。而自宋代金石学创立以来，碑帖研读临写蔚然成风，碑帖善本举世积撰，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

策展人之一、西泠印社社长童衍方近日在上图东馆为公众讲述他眼中的“大汉雄风”。《文汇报》在此刊录部分讲座内容。展期至2024年1月7日。

我是1978年进入上海中国画院的，专攻书法篆刻。在我看来，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从来没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无论是碑帖印刷的质量还是品种，信息量之大，都是古人不能企及的。如果大家会学习的话，可以选一些碑帖，现在的印刷只下真迹一等，还有许多的展览可看。在社会节奏那么快、科技那么发达的情况下，碑帖研究与书法研究是能够养心养神、帮助你安定的一帖良药。

观摩研究碑帖有很多视角，包括文献性、文物性等，我则从书法、刻印的角度，来讲此次上图“大汉雄风”展上的碑帖。

由篆变隶的年代

汉代的通行文字是隶书，也有少数碑刻是篆书。

《群臣上麟刻石》一共十五个字，是西汉的刻石，非常珍贵。“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麟此石北”。第一个“赵”字，虽然写的是隶书，但右边缘篆的痕迹还在。“年”字，也是篆书。最明显的就是“月”字，第一笔是撇开以后再带下来，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篆要变为隶的时候，一半篆书一半隶书，但总的说来有隶的味道。

所谓摩崖刻石，石头都是不平的，刻的时候就有一种自由感，再拓下来，浓淡淡交融在一起，十分自在。大家看碑帖的时候要记住这种感觉。

汉代的很多文字是非常有味道的。像带个圆头、初具碑形体的《隳孝禹刻石》，字的横画竖画都不拘一格。《袁安碑》则是一个很标准的篆文的碑。“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口。”每行后面损坏了一个字。它的字体结构非常标准，线条非常圆转。这块碑是临习汉篆的范本。后来流行的铁线篆，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

在由篆变隶的年代，也有碑文又像隶又像篆的，像《祀三公山碑》就是篆隶在一起，是比较特别的。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从中吸取很多，包括结构、用笔，还有就是齐白石，他写的篆书对联全是用这个字体。这件《祀三公山碑》本身字体浑厚朴实，拓本又特别好，靠近了就能感觉有一股厚古的气质在吸引你。拓得不好，就没有这股气场。

《曹全碑》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的字特别娟秀柔软，但是结体又非常经得起推敲。移碑时，首行末“因”字受损。“因”字不损本十分少见。我们这次展出了一个火烧本，仅次于“因”字不损本，也是在明末之前，碑身未被大树压折断裂的时候拓的。

说来奇怪，像吴昌硕写字这么奔放，这么雄强的人，他下功夫下得最多的却是《曹全碑》。这次展览上的《曹全碑》，有两件他都有题，有一件他题的时候只有四十几岁，说明他慧眼独具，反其道而行之。我的老师来楚生隶书也写得非常好，人家就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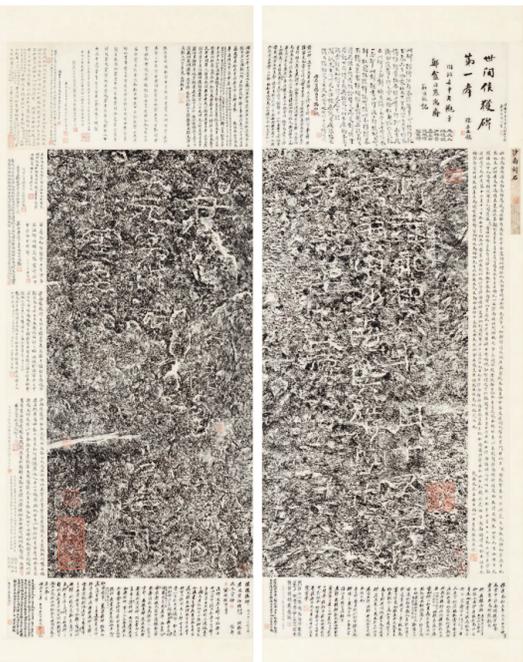
▲《群臣上麟刻石》(陆机藏本)



▲《张迁碑并阴》(蒋氏赐书楼藏本)



▲《曹全碑》(俞复藏本)



▲《沙南侯获碑》(潘祖荫藏本)

他，你最主要是写哪个碑，他说他都写。后来他跟我说，实际上我写《曹全碑》最多。所以聪明的人都会做组合，他说我写《曹全碑》，然后写唐云先生藏的金冬心，做加法。组合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汉代的篆书，要看汉碑各种各样的碑额，也就是标题。因为装饰需要，标题都是用篆书。碑额里最漂亮的之一就是《张迁碑》了——“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汉”字三点，极具装饰性。“城”字一笔带上，充分发挥，下面两个脚相当漂亮。“荡”字有一股气势，全部朝一边倒。这就是“缪篆”——一种变形的篆，妙不可言。古人把汉代的额用双钩的方法钩出来，以供传阅玩赏。我们现在有照片了，可以把汉代的额集在一起观看。碑额是我们学习汉篆的宝库。

这些字都是动静结合的。大家看这个“阴”字，左边把它放稳了，右边就动了。“令”字，上面的盖头左右是一样的，而这个就不对称，左短右长，左曲右直。盖头动了以后，下面就不动了。可以说，这大小、曲直、对称、夸张，在碑额里面用到了极致，但是你没觉得它有妖气，也没觉得过火。这个分寸感掌握得太好了。很多书法家都在里面取法。

题跋的大合唱

好的碑帖还要有人题。此次展出的《群臣上麟刻石》陆机藏本的珍贵之处就在于此。惠兆壬的题跋里主张此石为后赵建武六年(340)刻，而吴峻接手过来，详细考证，论证此石年代实为前158年，西汉赵国群臣为赵王遂祝寿，一行人经过广平一带，登山揽胜所刻。吴峻用隶书写了五百字，而且是打格了以后再写的。一个拓本，本来是一个光光的东西，现在左边有了题跋，而且有长题短题、上题下题，就好像一部交响曲。

要题碑帖，首先要书法好，又要文句好，措辞妥当，这就考验古代文人，一定要能够言之有理，且言简意赅地解决问题。我们在看好的拓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旁边的题跋。

再来看展厅进门左边最大的一件，潘祖荫藏《沙南侯获碑》。我们一般看到的拓本，拓出来的是三行，它是六行。这是仅此一件的，可以说天下无双。碑拓得好还不算，它还有这么多名家题跋，是一个题跋的大合唱。这次展出，我们把外护的楠木书匣也摆在旁边。可以说，一个碑单单是拓出来，没有文人的加入，没有题跋的考证，就没有那么多信息，也没有这么多可欣赏可参考可把玩的珍贵资料。这些都是我们欣赏碑帖的重要因素。

这件最上有翁同龢题的“世间《侯获碑》第一本，同治壬申冬观于郑庵司农寓斋”，郑庵就是潘祖荫的号。下面是非常有名的陈三立；旁边是高野侯，著名的高家兄弟之一；

冯开，很有名的书法家、文学家；褚德彝，大家看这次展览就会发现，他题得最多；以及张之洞、吴大澂，还有王懿荣。释文在左下角。所有题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考据点出发的。可以说，这件碑帖的题跋、装裱都给我们做了示范，代表了碑帖题跋的最高境界。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原碑在新疆阿克苏，是为左将军刘平国筑关建亭工程所作的颂文，内含“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吉语。原碑在五十公分左右，拓片旁陆陆续续十几个人题，整张有大概一米四长。小小的一张拓片，有这么多人题。释文在下，也是打了红格子的，可以看到古人对碑帖珍品的一种敬畏感。再看题跋的每个人的位置，都不抢的，题跋内容也是各有高低长短，互相照顾，互相补充，角度又都不一样。这就需要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对碑帖的理解。

清代的隶书能直接跟汉代的隶书对接

清代隶书的大家从郑簠开始，到金冬心、黄小松、翁方纲……清中期许多人，以及晚一点的赵之谦、何绍基，包括近代的吴昌硕，大概十几人，都在汉碑上下过功夫。说起来，清代的隶书是能够直接跟汉代的隶书对接的。因为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以下，一直到明代的隶书还是不规范的，自己臆造，结构也不好。清中期以后因为修铁路、开展很多考古活动，出土了不少汉碑原物。再加上清代的乾嘉考据、释读方法也都比以前好，晚清还加入了一些西洋的考据方法，很多东西都能非常精确地释读出来，所以清代是写汉隶大放异彩的时代。你去看傅山、王铎，也写隶书，但都不入道。清代的隶书写出来就是两样。

邓石如是第一个用行草的方法写隶书和篆书的书法家，这样就把写隶书篆书的人解放出来。乾隆以前，写篆书都是铁线篆，毛笔开个像，为了圆整、规矩，下面不打开，好像包着小脚走路。只有邓石如开出新路。他是纯粹地靠写字的功力取胜。你看这么多碑帖里，都没有什么他的题跋。爱碑帖的人里，有很多是考据型学术型的，也就是只考据不写字，或是兼而有之。邓石如一生活清贫，只活到六十多，也不跟达官贵人交往，相对比较闭塞，他是靠自己耿直的脾气和勇往直前的性格，苦练出来。如果他像伊秉绶或者其他学者一样，有些条件，再给他多一点东西，他就更加了不得——但是没有如果，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取向。他是清代隶书里最最特出的书家。

碑帖拓片是有一种天趣的。像残石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风化，已相当好看，再加上有好的捶拓，更加有味。另外，摩崖刻石本身就是不平的，刻写的时候受到石头高低的阻碍，古人克服这种阻碍的技法，都别有风味。像《石门颂》，它的天趣，就在于在硬的石头上，展现出了柔软的感觉，而且转折里各种方笔圆笔，自由发挥。这次展出的这件《石门颂》是张的淡墨拓。据仲威老师说，它下面可能是个风口，拓的时候大风老吹，明显上面稍微浓一点，下面淡一点。你看它的字，是软的飘的，但都是有分量的。

而且汉碑很奇怪，你把它放大一层，它的气势就大一倍。像《张迁碑》，此次展出的有一张整拓。整张本的气势还是两样。而且这么多石花配在里面，一点也没觉得抢，反而让字更加劲有力，有莽莽之气。

我想对在座的年轻人说，我们处在如此便利发达的时代，应该尽量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受某些因素干扰，潜心学习一门传统艺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这样一门延续多年的传统艺术，确实是值得骄傲。

图：《君车画像并阴》(周大烈跋本)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管理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关系日益密切，那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述了。”然而，“翻阅国内现有的词典一类工具书，竟然查不到‘行政管理’这个词，似乎已处在‘被遗忘了’的地位。”1982年，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教授周世述撰文呼吁在我国恢复重建行政管理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周世述(1913—1997)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科奠基人之一，今年是他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在华东大学和湖南南得两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周世述学论文集》首发、《周世述管理研究院》揭牌、第三届周世述公共管理学术会议召开、周家百年老宅变身“课堂”……以缅怀这位“大先生”的杰出贡献，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弘扬他的精神品格。

周世述原籍浙江吴兴(今属湖州)，1913年生于上海。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后赴美深造，于1939年获哈佛大学公共行政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前身)公共行政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任教于西南联大，1954年7月被调至华东纺织工学院任教。1982年，他发表《一门“被遗忘了”的学科——行政管理学》一文，同年担任全国首期政治学讲习班行政管理课程主讲教师，培训了新中国首批行政学教学科研骨干，1984年编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部行政学著作《行政管理》。华东大学党委书记刘承功表示，周先生是管理学科领域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也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师者。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丁煌认为，周先生提出的“行政宏观管理是系统综合管理”“行政管理改革的不平衡性”“面向服务和宏观协调的开放式行政模式”等理念，为新时代中国行政管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支持。

“当此纪念周世述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回想大师当年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历历在心。”上海市社联兼职副主席李琪说，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1986年成立，他为学会筹备曾多次向周老请教。而此前一年，上海市委党校开办的全国第一个行政管理大专班，使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周老1984年出版的《行政管理》。李琪请周老上了第一课。他回忆周老最注重的就是，行政管理学理论首先要让广大行政管理干部学懂弄通。

周世述先生最早提出“建设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志华谈到，周先生前瞻性的学术思想无不源于他强烈的家国意识、本土意识、自主意识。他的远见令人钦佩。如何接续周世述先生的事业，“心怀‘国之大者’，与时代同频共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后辈学人努力的方向。

《文汇报》在此辑录相关文章，展现家人、同道、学生眼中的周先生。

外公早年越洋求知，中年勤勉治学，晚年勤奋奠基，他的一生质朴厚重，也充满传奇和光荣。我虽然没有和外公朝夕相处，但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关于他待人接物、学术风骨和优秀品质的故事。例如他数次放弃在国外的教职机会，毅然回国从事教育事业；他吃穿节俭朴素，总是坐在书桌边上读书写字，以及深入基层调研；他身患癌症仍然坚持工作等等。

外公的报国之情、经世之才、立身之德是我们后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

——吴征(周世述先生外孙，阳光七星投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周世述先生是我们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更是我们政治与公共管理学术界的引路人和奠基人。从近代历史走进周世述先生，更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和远见卓识。

——鲍静(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

周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很多学术观点新颖且富有前瞻性。周先生曾用“国家兴衰之所寄，四化建设之所系，人民生活之所依”概括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性，并指出我国行政改革的不可逆性和不平衡性等问题，提出行政管理改革要抓好“势、度、序”这“三字经”。

“势”就是因势利导，抓住优势；“度”就是不失分寸、求其适度；“序”就是先后有序、按部就序。一句话，要搞好行政管理改革，必须做到顺势、适度、适序。这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李琪(上海市社联兼职副主席)

纪念

追寻『大先生』的足迹

周世述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本报记者 李纯一



▲ 青年时期的周世述

周世述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思考和探索中国行政管理本土化即特色问题，认为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研究得不够，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问题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的原因。

先生特别强调行政管理学的实践属性，强调研究不能寓在书斋里面编写和杜撰，要深入实际；先生还强调行政管理学的系统性问题即知识体系的问题。这些都是周先生在构建行政管理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上的贡献，对推动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

——吴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

周老是一个兼具开放气度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风骨的大家，他擅长与各方面打交道，均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他毫不藏私地带着后辈们参与国际国内各类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把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我希望这种至诚的光芒能永恒地闪耀在一代又一代行政管理研究的“后浪”身上，传承不绝，指引具有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辉煌。

——孙荣(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

文汇报学人

第569期

